

争论,爆炒还是慢炖?

乡村的二流子

□ 马卫

哪朝哪代,乡村都有二流子,即使在“阶级斗争”搞得如火如荼的1970年代,乡村,仍有二流子游荡。

那时候,我太小,有些怕这些二流子,特别是几个出名的,一是我们队的黄加全;二是四队的刘独膀子(只有一只手),三是山梁那边一队的白麻子(姓白,一脸的麻子)。父母一再叮嘱,见了这几个人,躲。

说黄加全是二流子,有些冤枉。那时,他在老棚子公社开的小煤窑里挖煤,每个月有二三十块钱呢,这比在集体种庄稼的人,日子当然好过。可是,这人有了钱,就开始吃喝嫖赌,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一起乱搞。比如,他和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寡妇同居。黄加全的钱,当然用不了多久,粮也吃不了半年,于是每到冬月,就背着个布口袋,走进其他社员家。

你给也得给,不给也得给。他不是乞讨,而是借,当然有借无还。

好在他“借”得不多,一家一碗米。所以,对黄加全这种二流子,躲不了,生产队的人拿他没有办法。他是个拖油瓶的儿子,继父管不了,生母不管他。直到改革开放,黄加全离开了那个寡妇。结婚成家,好好过日子。不过有了二流子这个名声,当然也要不上好老婆,这女人又喝酒又抽烟,他们家的日子仍然过得凄惶,好在现在不向每家“借”粮了,上面的救济,从来没有跑脱过。

心灵小品

懒村

□ 范方启

无论是向东还是向西,只要我外出,总绕不过一个村庄。那是一个怎样的村落呢?百来户人家合抱着一一条有些年数的柏油路,普普通通,毫无特色。无数次地从这个村子穿行,我渐渐地感受到这个村子像在一场睡眠中打着哈欠,伸着懒腰漫不经心地醒来。

吵醒这个村子的是一所小学校。那所学校原在偏僻的山坳里,八成是嫌山坳里交通不便,便搬一个整体搬迁。“小皇帝”和“小公主们”来了,这是一些不可小觑的消费群体,他们走到哪儿,商店和玩具店就到哪儿。卖文具的,卖零食的,卖早点的,小学校旁边一下子就冒出了六七家店铺。孩子们来了,大人们也跟着来了,这些大人们早晨带着各种车辆送孩子上学,傍晚还得将这些祖宗们接回家,村庄就更加热闹了。

学校来了,村部好像也不寂寞,上这儿找伴儿来了。村部来了,村级医务室也跟着来了。都凑凑热闹了,来了好,就怕你不来,精明的生意人意识到挣钱的机会来了,于是几家看上去有点威猛的超市拔地而起,卖小吃的,卖鱼卖肉的,修车的,修鞋的,理发发的,都来赶趟了。村庄于是有点像街道了。那时,我想,一个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的村子,总该彻底醒过来了吧?

可是,日久天长地在这个村中

手机语文

春江水暖谁先知

□ 董改正

东坡的题画诗《惠崇春江晚景》,描绘了宋代早春二月生机勃勃的景象:疏竹,桃花三两,春江水暖,鸭凫水,蒹蒿满地,芦芽刚刚冒尖,再加上画中未有,东坡嘴馋想象出来的河豚动态:欲上,和那只只可爱的鸭子,嘎嘎凫水,千年之后,仿佛犹闻其声。

鸭子成了这首诗的话题之一。康熙年间,大学者,大诗人毛希龄批评道:“春江水暖,定该鸭知,鹅不知耶?”这有点抬杠了。鸭鹅都耐冬,鹅当然也知。但这是题画诗,画上没有鹅啊。可是如果当时有人据此反驳,毛老定会悍然问道:“画中有河豚耶?”

毛老才高,谁也看不上眼。他读朱子,身边摆个稻草人朱熹,若是解得不合己意,就连打带骂,对苏轼算是客气了。因为谁都看出他找茬,也没人应他,所以直到现代,他才找到了知音,也是质疑鸭鹅的。

看到几句妙解:其一,鸭的耐寒性大于鹅,要不我们怎么都用鸭绒被,穿鸭绒衣呢?这句话的逻辑大有问题,随便换两个概念套入,就能发现它的荒谬。其二,鸭的祖

社会,争论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环节,在争论中达成共识,即使没有达成共识,也让各种思绪有了表达和宣泄的出口。涓涓细流,小火慢炖,功夫到了自然熟。

可惜,人有时就是那么奇怪,看似喜欢大同,大一统,又满脑子斗争哲学,仿佛一争论,就得你死我活,这是象棋思维,拼车兑子,血流成河,结局虽然多有和棋却两败俱伤。其实世间事,哪有那么多些非黑即白,你死我活?地球足够广阔,因而除了动物还有植物,除了原核生物还有原生生物;如果心灵和头脑足够广阔,也容得下不同人之间的种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。况且,哪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没有绝对的对错,只是基于现实条件选择的结果。就像黑白分明的围棋思维反而最讲究借势造势各自发展,虽分胜负却双双双赢活。

不会争论,归根结底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争论。读书是为了明理,明争论又是为了什么?上高中的时候参加过学校的辩论赛,年少轻狂,颇逞口舌之利来着。带队的老师却不以为然,他问我辩论是为了谁赢?我说当然是为了本队的胜利,难不成是为了让对手赢?老师说:“错了,辩论的目的是为了让真理胜出。”我听完呆若木鸡,一直到今天想起这话还时时手心冒汗。后来我又读了许多书,参与过很多讨论,如果只允许我分享五个以内的观点,我想这是其中一个。

不大会争论。特别是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,我们的争论总是特别容易滑向恶言相向、人身攻击的渊藪。这不禁让人怀疑,是对自己所持观点不自信,还是根本就缺乏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讲清楚的能力?不然,为何动不动就需要漫骂甚至撕打来给辩论收尾,而辩论的结果却无人关心了呢?偏偏辩论的观众也是一样没出息地配合——不关心辩方说了什么,不关心辩论的结果如何,只为其中的喧嚣与骚动所吸引,沦为为一个彻底的看热闹不怕事大甚至推波助澜的看客。却从不想一想,这辩论的结果本来可以影响甚至改变自己的生活来着。辩论的时候只会演闹剧,生活的时候活该就只配得上不公平、不公正、不安全的悲剧。

这样的争论,恰似火候掌握不当的爆炒,油花四溅烫伤了厨子不说,还做了半锅难以下咽的夹生菜。

更为恶劣的情况是,当争论双方不够势均力敌时,一方居然对另一方封口。因为别人的思想不合自己的胃口就对人封口,其产生的恶果远远高于任其思想传播所能带来的。一言不合就封口,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怀疑,下一步二言不合就是灭口了。万马齐喑,道路以自己背后所累积的不信任和愤怒,如鲁迅先生所言,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灭亡。小到家庭,大到



时尚辞典

愚公移风

□ 邹伯芬

农历新年,城里人走了大半,路上车龙消失,烟火烧到年初十还没停。我在烤串店的落地玻璃窗边,看着戴各式重型口罩的行人来来往往。那天的空气污染不算特别严重,还残留融雪的清爽气息,“雾霾”却突然又成了整个国家的关键词。

手机里那些“会呼吸的痛”的雾霾段子,没有雾霾的地方的人们事不关己一笑置之,以为我城从来没有“雾霾天”。别犯傻了,就像北京过往把“空气污染”报导为纯粹“大雾”,“雾霾”在一些地方,不过换了“烟霞”这个诗意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。我们为培养成只顾察颜观色,完全不懂看天吃饭的一代,比地震前赶紧搬家的蚂蚁麻木不知多少。

不看来,是因为我们相信数据多于经验,倾向科学多于迷信,重视政府聘用的大文学家多于家中奶奶的意见。人类对自然的态度,决定了文明的走向,两者间的爱恨情仇,多少部砖头般厚的巨著都写不完,然而大多数时间,都徘徊在“听天由命”和“人定胜天”的逻辑当中。农耕时代,人们敬畏自然,又设法观察、理解、适应,归纳自然,牧人善逐水草,渔民指测风云,农民目推晴雨。文明的苗儿和迷信的杂草同根共生。东汉张衡弄了个旷世浑天仪,三国的孔明还得登坛作法借东风。历史快速进带,西方工业革命

问题也随之而来,什么样的分享才是好的或者说恰如其分的?就食物而言,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与“己所欲勿施于人”同样重要。对食物的好恶这样太具个体差异性的特质,求同是极其困难的,正应了那句老话“此之膏糖,彼之毒药”,鉴于每个人的生长环境,生活习惯,健康状况千差万别,对待食物最好是各取所需。既然是各取所需那还分享个什么劲儿呢?可是再美的食物,如果调料是空虚寂寞冷,器皿是无情无趣冰,恁是铁心肝,石肚肠怕也难以下咽吧?所以,如果没有运气遇到“吃得来的人”来分享共同爱好的食物,分享对食物态度,吃食物的氛围,甚至是料理食物的方法也是好的。总之不要强人所难,即使是为了健康这样的理由也不可以。

比分享食物更难的是分享思想,特别是当讨论进入到争论的程度时。争论是讨论最核心的部分,没有争论的讨论,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它本无必要或价值不大。可很多时候,我们还是害怕争论。自百家争鸣之后,被焚书坑儒吓怕了的我们,仿佛喜欢上了大同世界,习惯了大一统,急着要做顺民,一争论,仿佛就不够和谱似的。其实,正如苏格拉底所言,未经思索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,未经争论的和谐,又怎能称得上真正的和谐?

因为害怕争论,不习惯争论,自然也

聆听山水之音

——纪念孔孚老友诞辰90周年

□ 张盛斌

孔孚(1925—1997),原名孔令桓,山东曲阜人。他是当代著名山水诗人,作家钱锺书赞誉他的山水诗为“开门户”。诗人贺敬之称:“‘五四’以来,新诗到孔孚是一个新的突破。”哲学家辛冠洁推重孔孚诗为新诗史上“里程碑”。纽约《华侨日报》以《中国新山水诗人孔孚》为题,用整版篇幅介绍孔孚:“‘五四’以来,写山水诗的诗人不多,专写山水诗的诗人更少。第一个专写山水诗,第一个出版山水诗集并有山水诗论的人,到今天只有一个,他就是著名的山东老人孔孚……孔孚为当今中国新诗坛山水诗祭酒。”

孔孚幼年在打麦场上被误伤了右手,从此只靠左手劳动和写作。

1947年,孔孚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,1949年春进入大众日报编辑部工作,任文艺编辑。他对人诚信,不说假话;看不得任何虚伪的东西,容不得各种形式主义。

上世纪50年代的“反胡风”和“反右派”,孔孚两次受到不公正的处理。“文革”期间,孔孚再遭无休止的批判和斗争。直至1979年才获得平反,其时他已年逾半百(54岁)。

平反后,应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史家、时任山东大学报学院副院长田仲济教授之邀,孔孚由大众日报社调往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,从事中国新诗研究。这成为孔孚创作历程中一个崭新的起点。他在研究《中国新诗发展史》中,发现了中国山水诗的“断线”问题,这激发了他创作山水诗的热情,他暗下决心,要将丢失的中年岁月,在老年重新操觚夺回来。

他登泰山,攀峭壁,写黄山,咏峨眉……诗兴大发,而且“一发而不可收”!不久,他的《山水清音》,《山水灵音》出版。之后,《孔孚山水》和诗论也相继问世。

关注孔孚山水诗的人多了,推崇研究他的新诗的人也多了,包括报刊媒体,诗人、学者、史学家、工人、学生等。孔孚花甲之年出版的首本《山水清音》,被《中国新诗大辞典》列入“五四”以来名著条目。他的《山水灵音》也获得了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创作一等奖。《青岛大学学报》刊载的《孔孚山水诗之艺术追求给予中国新诗坛的启示》一文中写道:“相信孔孚能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面。”庆幸孔孚已与钱锺书结为忘形交。钱锺书给孔孚写信赞赏他的新诗,热情为《山水清音》定名题签。著名诗人孙静轩称孔孚的诗“是当代诗界的一个新品种,一个稀贵的品种”。

他的新诗中表现的“隐象”“灵视”“减

纸上博客

强词夺理

□ 安立志

有的人一当官,就滋生了“官性”,失去了“人性”。及至摘掉官帽,“官性”才会慢慢衰减,“人性”才会逐渐回归。唐玄宗李隆基是当时最大的官,他既是盛唐的开创者,也是盛唐的毁灭者,实现“开元之治”的是他,导致“安史之乱”的也是他。在他身上,先后出现了英明与昏庸、勤勉与怠惰、俭朴与奢侈的不同特质。在其执政后期,由于承平日久,整天坐在大明宫内,泡在华清池里,李隆基身上只剩下“官性”或曰“皇性”,早就没有了“人性”。

天宝十五载(公元756年)六月,安禄山叛军攻占潼关,逼逼长安。年逾古稀的李隆基,未及通知朝中百官,撇下外出的嫔妃、公主、皇孙,于十三日凌晨,带着杨贵妃姐妹、部分皇亲国戚、朝廷近臣及亲信宦官,在几干禁军护卫下,打开禁苑西门——延秋门,仓皇逃走了。

这个年迈的皇帝,危急之际,曾经的良知似乎甦醒了。逃亡途中,杨国忠要焚毁国库,李隆基制止道:“贼军来后得不

人性在逃亡中回归

到,必然加重对百姓的搜刮,不如给他,以免加重百姓的困境。”“贼来不得,更敏于百姓;不如与之,无重困吾赤子!”杨国忠要过火烧桥,李隆基责备道:“土庶(官民)各避贼求生,奈何绝其路!”李高力士把火扑灭再赶上队伍。逃亡中的李隆基,残存的人性如萤火寒星,散发出可怜的微光。一行人蹒跚行至咸阳附近,向来养尊处优的公主、皇孙们,饥渴难耐,李隆基只得亲自找到百姓门上讨饭吃:“卿家有饭否,不择精粗,但且将来。”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,一看他们的领袖沦落到如此地步,于是“争献馘饭,杂以麦豆”。这些平日吃腻了珍馐佳肴,山珍海味的皇孙们,此时才会体会到什么是饥饿,“争以手掬食之,须臾而尽,犹未能饱。”“以一人治天下”的制度,通常也以“天下奉一人”从来不曾尝过艰辛的李隆基,此时的举动着实令人动容。他吩咐从人给百姓送了饭钱,并表示感谢与慰问,颇有古代工农军之作风。

此时,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主动向玄宗进言,核心思想是,皇上听不到真话才有今日之流亡。他指出:“禄山包藏祸心,固

非一日;亦有谄附者其谋者,陛下往往诛之,使得逞其奸逆,致陛下播越。”老人赞赏玄宗执政前期的任人唯贤,正因为重用说真话的宋璟,“天下赖以安平。”而到执政后期,官员们不是“以言为讳”,就是“阿谀取容”,甚至重用了李林甫,杨国忠这样的坏人,皇上与外界隔绝了,以致“阍门之外,陛下皆不得而知”。中央与地方、朝廷与百姓,遥遥凶山几九重。身在草野的百姓,不乏有识之士,虽有“区区之心”,但因“九重严逼”而“无路上达”。如果不是皇上落难至此,一个乡下老农怎么能见到九五至尊并能给皇上说出这些肺腑之言(“臣何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”)!此番言论,推心置腹,情真意切,说是进言,近乎教訓。玄宗听后,不仅有龙颜大怒,反而感慨万千:“此朕之不明,悔无所及!”

郭从谨老人的进言,当然不可能像《资治通鉴》记载的那样文绉绉,这大抵缘于司马光等人的语言加工。不过司马光作为北宋重臣,能在官史中加入这样的“花絮”,也是期望后来的执政者以为鉴戒。按照我们划分“政治面貌”的传统,郭从谨只是普通“群众”,唐玄宗则是伟大领袖,普通群众教